

清代台湾进贡西瓜探述

方圣华^{1 2}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2.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康熙统一台湾后,台湾物产被进贡至朝廷,其中西瓜的进贡尤为特色。西瓜等物产的进贡不仅是清廷认识台湾的一种途径,更是其对台统治与教化的政治象征。台湾进贡西瓜历经雍乾三代,既有清代官员进贡的一般特征,也有其特殊性,如贡瓜的瓜种非台湾所产、台瓜进贡戛然而止于官员贡风最盛的乾隆朝等。探讨其特殊性或有助于丰富学界对清代进贡制度的了解。

关键词:台湾;西瓜;进贡;土产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8)03-0096-07

DOI:10.14157/j.cnki.twrq.2018.03.011

进贡,即臣下或藩属向朝廷、君主进献物品,或起源于夏禹时的“任土作贡”。周朝时分封建国,专设九贡,令各地诸侯进献物产以充邦国之用。秦汉以降,进贡体系继续发展,到明清时已臻完善,主要包含了两大层面:一是朝贡,即藩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进献与封赏,体现了华夏中心意识下传统外交关系;二是官员进贡行为。此种进贡又可细分为两类,其一为官员代表地方向朝廷的进献,如清朝就规定各省每年需向户部、工部进献物品若干;其二为官员以个人名义向皇帝的进献。本文所讨论的台湾进贡西瓜即属于此。相较于朝贡体制研究成果的丰硕,学界对于官员进贡行为的研究仍显欠缺,有关清代官员以个人名义向皇帝进献的探讨更是如此。^[1]笔者分析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后,发现台湾进贡西瓜具有某些特殊性,对于深入了解清代进贡制度当有所裨益,而学界对此关注不够,故不揣冒昧,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西瓜进贡清宫

台湾何时开始向清宫进贡西瓜已难以考证。有学者称清宫与台湾西瓜的关系最早见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四月(注:本文中月份皆为农历)。^[2]据笔者所见,是年正月十六日福建浙江总督范时崇就已因西瓜进贡问题向康熙奏报,“窃臣每岁进御西瓜皆从台湾采买”。^[3]可见,康熙五十二年之前台湾产西瓜就已贡至清廷。

康熙五十二年之前,进贡西瓜都为台湾本地种,是年四月清廷御赐瓜种至台。时任福建巡抚觉罗满保回复上谕“窃照四月十一日,奴才家人返回,赍捧瓜子一匣传谕:著此带至福建试种。”^[4]接到瓜种后,觉罗满保即命人分赴各地种植,除福州、漳州、泉州外,大部被送往台湾。由于两岸瓜期不同,福州、泉州西瓜七月即已成熟,觉罗满保先行呈献,但受到批评。康熙批复称“此物,朕未曾

作者简介:方圣华,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令尔呈送,只是说在台湾地方试种。将此作为一事贡送,殊属不合!在福建种之何用?”^[5]台地瓜种直到八月方才播种,因十一月雨水少,加之首次种植水土尚未调和,西瓜生长并不理想。

对此,康熙并未在意,次年依旧赐下瓜种,^[6]但第二次试种仍不合人意。据觉罗满保奏称“今携西瓜至,问之,言八月下种,雨水略少,十月正值生长之际,叶又生虫,故西瓜表皮稍有疤痕,而瓜瓢仍好,自十一月二十日始成熟,今携之来。等语。奴才亲自选看,外皮略有疤痕,瓜瓢无恙,仍好。唯今秋台湾雨水不调,故生长似有不足。”^[7]同时,受风信所阻,进京日期还被耽搁。康熙五十四年初(1715年)福建浙江总督范时崇奏称“上年十一月内,臣差标下把总沈国臣往台办运,据禀往回两阻风信,至正月二十三日始到福州,随即起行北上,至二月初六日到浙江衢州府。”^[8]

康熙五十四年第三次试种,受大风影响,结果仍不理想,令已升任闽浙总督的觉罗满保不胜惶恐。“五十四年圣主恩赏西瓜籽,奴才于六月派人带至台湾,八月播种,生长颇好,正值开花时节,九月十五日遇大风,藤断花落,损伤大半。奴才闻报,甚惧,急忙添派人员,共同加意培植,大者只得四十余,继之生长者皆小,已不能再长大。”^[9]也许是为了弥补,此次觉罗满保还挑选了台湾本地西瓜一并进贡。康熙则谓“西瓜事小,有何关系”,^[10]对觉罗满保加以安慰。

这三次种植所出现的困难,如雨水不足、大风、运输受阻等,之后仍不断出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觉罗满保奏称“御赐西瓜籽于八月播种,十月庄稼收割后,乃为西瓜长大之季,因雨水少,瓜大较往年稍逊。十一月二十九日由台湾装船来,因于澎湖候风耽搁十五日,故而年内未能运至。”^[11]为保证西瓜顺利生长,台湾地方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如分地种植。康熙六十年(1721年)因朱一贵起义耽误了本年瓜种的颁赐,直到闰六月瓜种方才到台,七月十四日分种于台湾县及南路观音山两处。之所以分种两地,也许与起义甫平社会不稳有关,客观上却减轻了大风破坏。“生长正茂时,八月十三日因风甚大,次日赴园子观之,见瓜藤被风刮走,找出瓜根,虽加土灌水培养,仍不开花。观音山下所种西瓜地势低洼,风害略轻,复经培养渐苏,获西瓜大小不等八十个。”^[12]

大体而言,康熙时台湾进贡西瓜已然成例。每年年初清廷赐下瓜种,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接到瓜种后派人赴台择地于八月种植,瓜园分处于府治小东门外^[13]与凤山县观音山脚,由官府派人治理。待十一二月瓜熟后装船运至厦门,再转福州等地。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等择优挑选,各派员驰送至京,以供皇宫正月或万寿节使用,正所谓“恰好来春逢圣诞,急驰新果献京华”。^[14]进贡数量早期未定,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时定为督抚各“八十个足矣”。^[15]进贡品种既有御赐瓜种又有台湾本地种。

雍正、乾隆时期西瓜进贡大体遵循康熙年间成规,只是御赐瓜种、进贡数量与品种会依时而变。康熙时清廷所赐瓜种无明确记载,雍正时为喇嘛种和榆次种。雍正四年(1726)四月,福建巡抚毛文铨称“理合恭请皇上将喇嘛瓜种俯赐给发至督臣衙门”。^[16]喇嘛种为山东德州瓜种,当时闻名遐迩。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浙闽总督郝玉麟在奏折中则言“窃照闽省向蒙内廷颁给榆次瓜种发交台湾种植成熟例”。^[17]由此可推论两点:雍正时所赐瓜种由喇嘛种改为了榆次种;乾隆早期所赐瓜种为榆次种。榆次种来自山西榆次,亦是贡品,“山右进贡有榆次瓜,闽中则腊月进瓜”。^[18]

进贡数量在雍乾年间屡有更改。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三,雍正就西瓜进贡数量问题连写两条朱批,其批复福建巡抚黄国才“发下瓜种,所种转年进五十个足用”;^[19]批复闽浙总督觉罗满保“赐籽西瓜,来年进八十个足矣”。^[20]雍正六年(1728年)福建总督高其倬收到指示“瓜进多了,此无用之物,专为供献之用,汝等各处通共三四十足矣,可通知抚、提一体而行可也。”^[21]鉴于此,督抚提就各献瓜12个。^[22]乾隆二年(1737年)进贡数量又有所减少,规定“福建督抚每年着进瓜十圆,提督不必进瓜,种亦不必发去”。^[23]这在时人的竹枝词中亦有体现,乾隆时的孙武水就写有诗句“深

秋播种清冬熟, 拣得西瓜贡十员”。^[24]之后, “乾隆间奉旨停贡, 其种遂失”,^[25]意味着西瓜的进贡最终停止, 但停贡具体年限难考。现有资料可查贡瓜最迟年份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是年杨廷璋奏称在渡长江时台湾西瓜遇风被水淹没。^[26]

进贡品种在雍正元年时就全部改为御赐瓜种, 台湾本地种不许进贡。“其泉州、本地之种所种皆不必进, 路远徒费, 不中用。”^[27]乾隆二年虽已不再御赐瓜种至台, 但闽地官员依然进贡有榆次种^[28]西瓜, 这应是台湾官员从留存或台地产出的榆次种中繁殖而来的。

为保证贡瓜新鲜, 官员多选择驿路驰送入京, 是为“驰贡”。^[29]西瓜自台湾运至福州, 正常情况数日可达, 但若受阻于海上风信, 则可能耽搁月余。清代连接北京福州的驿路全长4,848里, 共74驿。^[30]路上会耗去月余时间。^[31]西瓜在长途运输中仍能保持新鲜, 如雍正曾评价“今年西瓜种着了, 甚好”,^[32]重要原因在于进贡时间为年底, 气温低, 利于保存。据研究, 冰温和冰温套袋贮藏可使西瓜的保质期延长60天左右。^[33]运输时若有所延误或不在年底进贡, 官员就十分担心西瓜变质。“然恐气候炎热, 沿途月余, 变坏亦未可料, 奴才为御览之物不能完好送达, 不胜惶悚之至。”^[34]“但因阻风, 较之往年迟进十余日, 又恐天气渐和, 前途不无少有损坏, 理合具折奏明。”^[35]

贡瓜经长途跋涉到达皇宫后, 用途有三: 一、供皇帝及内廷人员食用; 二、“于春正恭进以备荐飧之用”,^[36]即充作节令时仪的祭祀用品; 三、赏赐给官员大臣, 如乾隆曾赏赐直隶总督李卫台湾西瓜一个, 令其感动不已。^[37]

二、台湾进贡西瓜之特点

官员以个人名义向皇帝的进贡在清初比较随意, 随着官员进贡趋多, 逐渐形成共性, 这在官员进贡资格、进贡时间、进贡经费来源等方面都有体现。

官员进贡资格。由于没有明确史料, 所以康雍乾时期到底什么品级的官员才有资格向皇帝进贡难以确定, 只能从间接史料中考察之。咸丰五年(1855年) 谕旨写有“向来各督抚、将军、府尹及盐政、关差、织造等例贡方物, 着期年内暂行停止。”^[38]虽不知“向来”自何时始, 但乾隆间的一则上谕为其作出了部分解答。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八月初二日的上谕档记载了一份王公大臣进贡名单, 其身份主要有亲王、郡王、贝勒、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总督、巡抚、将军、提督、盐政、关差、织造及衍圣公。^[39]可见, 作为地方大员的总督、巡抚、提督是有资格向皇帝进贡方物的。据史料, 台湾进贡西瓜自康熙以来一直也都是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和福建水师提督的特权。乾隆二年谕旨“提督不必进瓜”, 福建水师提督贡瓜资格被取消。

进贡时间。清初, 每逢年节、万寿节官员都会进贡以示庆贺, 逐渐形成定例, 即所谓的年贡、端阳贡、万寿贡等。康熙生日为三月十八, 官员有时会在万寿节前贡瓜至清廷, 即“康熙间以万寿节前贡至京师”,^[40]可称其为万寿贡。长时段来看, 台湾进贡西瓜都是给宫廷正月使用的, 正如诗云“何须更沐温汤水, 正月神京已进瓜”。^[41]故总体上可将之归为年贡范畴。

进贡经费来源。清代官员进贡所需花费的来源主要有三: 一为官员养廉银。乾隆曾言“各省督抚每逢年节及朕万寿呈进贡物原以联上下之情, 在伊等本任养廉原属优厚, 除贍给自家及延请幕宾支用外, 出其赢余备物申悃, 因所不禁。”^[42]二为公帑支出。若皇帝指定某种贡物, 一般可用公帑抵销部分费用。三为商人资金垫付。^[43]台湾进贡西瓜的花费主要是从官员养廉银和公帑中支出。例证如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史奕昂奏禀, 原署凤山县知县鲁光鼎名下应追修理察院衙署并栽种西瓜盘费, 扣缺养廉等银约96两。^[44]可见, 栽种西瓜的花费是自官员养廉银中支出的, 正所谓

“应给瓜户园税、工资及解送盘费等银 系知县捐给”。^[45] 由于进贡西瓜瓜种为皇帝御赐,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皇帝指定贡物,故进贡费用也能从公帑中拨出。这在乾隆元年闽海关经费奏销项目中有所体现,是年有项开销为:每年总督、巡抚两衙门备办恭进果品银(正税盈余银内动拨)3,930两。^[46] 很明显,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进贡包括西瓜在内的果品所需花费可从公帑中支出。除去一般特征,台湾进贡西瓜还具有特殊性,这对于深入了解清代进贡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当官员进贡的贡品是自然物产而非手工艺品时,学者常会用到“任土作贡”和“土贡”两词。所谓“任土作贡”,指“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47] “土贡”意“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48] 早期土贡与赋税合二为一,即任土作贡,强调贡赋一体;到秦汉时贡赋分离,土贡与赋税相区隔,土贡的主要形式为官员向中央政府及皇室进贡物产。简言之,土贡源自任土作贡,早期为其组成部分;随着贡赋分离,任土作贡也就不复存在,土贡与赋税便发展成为两个独立个体。但无论是任土作贡还是土贡,先行研究在谈及这一问题时,都会将进贡的物品归为土特产或土产。^[49] 所谓土特产,现泛指某地特有的产品;土产在《辞海》中的解释为:本地所产之物也。唐书李德裕传“物非土产,虽力营索,尚恐不逮。”^[50] 可见,土特产或土产含义所强调的是地方土生土长之物而非外来物种。台湾进贡西瓜显然属于土贡范畴,但若将此西瓜称为土特产或土产则又有不妥。上文述及,台湾进贡之西瓜最初为台湾本地种,康熙五十二年始则主要是御赐瓜种,杂以泉州种及台湾本地种,故谓康熙年间进贡的西瓜属于土特产已属牵强。到雍正、乾隆年间,外地瓜种取代了台湾本地瓜种的进贡资格,若仍谓台湾进贡的西瓜属于土产则显然与事实不符了。且此种现象并非孤例,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甘肃巡抚绰奇在进贡新疆哈密瓜的同时还进贡了肃州(今酒泉市)金塔寺所产哈密瓜。^[51] 次年,绰奇更是“钦遵谕旨,未于哈密地方取瓜,于金塔寺处仿种之哈密瓜,奴才亲恭选五百”。^[52] 可见,先行研究将官员进贡的自然物产笼统归入土特产行列是有欠妥当的,值得继续讨论。

关于清代官员以个人名义进贡的发展趋势,先行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53] 以刘杜英观点为例,其根据宫中进单及其他史料,认为“清代早在康熙朝,具有制度意义的个人进贡便已初具雏形,经雍正朝的发展到乾隆时期已经成熟并达到最高峰。仅从一史馆收藏的清代宫中进单的数量上来看,乾隆一朝就占整个清代的一半”。^[54] 但台湾进贡西瓜的发展却与此不同,分析史料可知西瓜的进贡在康熙时就已完善成例,雍正、乾隆年间只是遵循康熙时成规,并未继续发展,且乾隆还停办了贡瓜。此外,其它食物果品的进贡亦呈现出类似趋势,如陕西麦面、新疆哈密瓜。有关这两种食物连年进贡的奏折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均有收录,经总结可知它们的进贡在康熙时已形成制度性规范。雍正年间它们仍依成例进贡,而到乾隆元年由于要遵行上谕“各省食物果品停止进贡”,^[55] 故麦面、哈密瓜的进贡不可避免受到影响。需注意的是,台湾进贡之西瓜由于是御赐品种,可不受限制。后虽又允许食物果品进贡,但能否达到“最高峰”,是值得探讨的。因此,先行研究所总结出的清代官员个人进贡发展趋势并不适用于台湾西瓜等食物果品的进贡历程,有必要对不同种类贡品的发展史加以区分。

总之,台湾进贡西瓜所呈现的特殊性,抑或说其对先行研究所呈现的一般特征的反动,使我们对清代进贡制度的认识更加具体,说明相关研究仍有探讨空间。

三、西瓜等台湾物产进贡之意义

官员以个人名义向皇帝进贡,主观目的无非是联络君臣感情。恰如康熙之言“夫贡物何足珍贵,正鉴其诚敬之心耳。”^[56] 乾隆之语“盖进贡之意不过借此以联上下之情耳,殊不知君臣之间,惟

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57]但官员们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在贡物的新奇方面大做文章,以期博取欢心。闽地大员最初在冬季进贡台湾西瓜可能也是出于新奇考虑,正所谓“西瓜熟于十二月,取充贡。三月望万寿前至京,俗名万寿果。味薄,但取其早熟耳。”^[58]虽然此时西瓜味薄,但因其早熟,属反季水果,在当时实属少见,具有新奇性,故受到康熙支持。客观上,进贡还为朝廷了解地方提供了一种途径。由于台湾孤悬海外,加之被中央政权纳入管理的时间相对较短,故清廷对台地的风土人情、气候、物产等情况并不熟稔,这可从乾隆时人们对于台湾进贡西瓜的评论中窥得一二。“台、凤两邑,每年分进上西瓜;八月下种,十一月成熟。气候之异,直不可以常理测也。”^[59]很明显,时人在得知台湾冬季仍产西瓜时是十分震惊的。除西瓜之外的其它台湾物产更是为清廷所不熟,如王瓜、冬茄、蕃酸、蕃茉莉、亚蕉、番槎等,康熙就曾提到“蕃酸朕一次未见过,曾欲看看”,^[60]“番槎从来未见,故要看看”。^[61]乾隆甚至对台地巨鱼产生兴趣。乾隆九年(1744年)三月闽浙总督那苏图在奏报闽省地方雨水情形时,顺提台湾有巨鱼搁浅。乾隆得奏后即批示“可图来看,并访有识其名者否”。^[62]七月,那苏图回奏称该鱼名海翁鱼,并将鱼图和鱼齿进呈御览。^[63]这些物产的进贡,在丰富清廷对台湾物产认知的同时,还促进了两岸物种交流,如蕃茉莉在康熙时“已艺植,繁殖甚多,京城各处均已种植”。^[64]而进贡奏折中提及的台湾地方情形,则为清廷了解台地的气候、物价水平、粮食收成甚至治安状况提供了另一种途径。也许正基于此,康熙对台湾物产的进贡保持着浓厚兴趣,并表示“若系朕欲览之物,再寄信去”。^[65]

台湾物产的进贡也是清廷对台统治与教化的象征。进贡在政治上的意涵可概括为“盖将以联中外之势,通遐迩之情,示王者一统无外,意至深远也。”^[66]具体到西瓜进贡,虽从奏折的字里行间难以找到有关统治与教化的字眼,但关于贡瓜的奇闻则可间接说明皇权对台湾民间社会的渗透。如“台有进上瓜地一区,约数十亩,所产之瓜,其子两旁有番字。台太守雇工种收,解交督抚转进,以此别为台瓜。此数十亩外所产之瓜,子即无番字,亦一奇也。”^[67]“正月贡至京,剖之,瓜子作‘𠄎’字形,因名寿瓜。”^[68]在传说中这些瓜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其贡品身份。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台湾民众眼中,这些作为贡品的西瓜不啻皇权的象征、统治的意象,故赋予其神秘性。而在西瓜的种植、摘取、运输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仪式感与慎重性,亦是皇权的表征。如“于白露节前择吉,知县到园敬谨下种”,^[69]“结实之时,最忌风雨;恐防损伤,择日选摘,分为两船西渡。”^[70]正因为其是贡品,乃皇权的象征,所以才需地方官员选吉日亲自播种,才需分船运送以防万一。更重要的是,进贡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对台湾的管理。

自台湾的进贡,除了西瓜,更具政治意涵的是“番民”进贡与贺寿。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进贡诸罗县属北路善跑之熟番七名、猎狗四条以供皇帝打猎;^[71]五十八年(1719年)再贡九名熟番给皇帝打猎娱乐。^[72]此时进贡“番民”,君臣看重的都是他们自幼习之的狩猎技巧,并未上升到统治教化层面。雍正十二年(1734年)值逢寿诞,闽地官员奏报“据各社番黎呈称,庆福等生长海外,久沐圣天子覆载洪恩,恭逢万寿圣节,欲率各社老少番众渡海赴省叩祝,以申感激微忱。”^[73]地方官员奏称“番民”祝寿,考虑到这时距台地平定大甲西社事件不久,故此举可能是为了昭示皇恩浩大、番社向心“感恩”、“迁善”和“德化”,为雍正大寿增添“绥辑万方、爱恤黎元”之光彩。^[74]雍正得悉后却告诫官员“岂可以目前之景而定必其永久输诚内化也?总在内外两地文武抚取得法,实心任事,便不输诚内化何碍之有?”^[75]此时,君臣都认为“番民”贺寿有着“输诚内化”的含义,只是雍正对此并不看重,他重视的是官员能够恪尽职守。乾隆四年(1739年)寿诞时,番社众土目联名呈称“窃老等蠢尔番黎,毫无知识,自入版图以来,极濡教化,共乐生成。谋衣谋食,圣朝之德泽,已普被于无疆;减赋减租,皇上之隆恩,复有加而靡已。沦肌浹髓,顶戴难名。虽属海外蛮

番,具有心胸知感。兹值皇上万寿,因路途遥远,不获相率众番赴都叩祝。老等番目一十八人,愿赴省城叩祝万寿,以展寸忱。”^[76]此后,乾隆五十三年、五十五年寿诞时“番民”还赴京祝寿。“番民”赴省城或京城贺寿的同时,亦有物产进贡,如乾隆五十五年进贡了“胎鹿皮一百张、豹皮四十张、番锦一百匹、千年藤五匣、沙连茶五匣”。^[77]乾隆年间“番民”的三次贺寿及进贡行为,虽缘由、背景不尽相同,^[78]但其中的政治象征是共通的,即表示“番民”对统治的服从和教化的服膺。对此,闽地官员以及乾隆都十分认可,乾隆更称“番黎等诚顺之意,颇属可嘉”。^[79]可见,与“番民”有关的进贡与贺寿行为,代表着清廷对台地“番民”统治与教化的政治意涵是不言而喻的,且这种意涵愈益为清廷所认可。

总之,闽地大员进贡台湾西瓜历经康雍乾三代,虽不知起自何时终于何年,但其发展趋势明显:由进贡台湾本地瓜种开始,再由康熙御赐外地瓜种来台种植进贡,其进贡模式在康熙时就已成定例,雍正、乾隆年间只是依规而行。包括西瓜在内的台湾物产的进贡不仅是清廷了解台湾的途径,更象征着其对台湾的统治与教化。此外,台湾进贡西瓜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反映出有关清代进贡制度的研究仍有探讨空间。

注释:

- [1] 据笔者所见,清代进贡制度以何新华的《清代贡物制度研究》最具代表,其余研究多以东北、广东、西藏等地区的进贡为考察对象,亦有以某种贡品为研究对象。相关成果可参见: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李石《清代康熙朝官员进贡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董建中《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刘杜英《浅析清代宫中进单》,《多维视野下的清宫史研究——第十届清宫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年;李凤飞《贡貂制度与清代东北治策》,《求是学刊》第28卷第5期,2001年;张赫《清代东北贡貂制度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朱志美《清代之贡貂赏乌林制度》,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张林杰:《清代广东贡品——中西工艺融合的见证》,《紫禁城》2007年第1期;朱家潜《故宫所藏明清两代有关西藏文物》,《文物》1959年第7期;唐郦薇《清代前期贡茶问题探析》,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4年;陈宜耘《清朝皇帝与台湾西瓜》,《北京档案》2010年第5期;李国荣《台湾西瓜进贡清宫》,《紫禁城》1992年第6期;黄宪华《清朝三帝关切台湾西瓜种植》,《两岸关系》2010年第5期。
- [2] 黄宪华《清朝三帝关切台湾西瓜种植》,《两岸关系》2010年第5期,第65页。
- [3] 《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二辑第九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291页。
- [4] [5] [6] [7] [9] [10] [11] [12] [15] [31] [34] [51] [52] [60] [64] [65] [71] [72]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48页,第895页,第927页,第992页,第1079页,第1079页,第1353页,第1505页,第1334页,第894页,第894-895页,第1125页,第1216页,第1386页,第1380页,第1380页,第1213页,第1380页。
- [8] [20] [29] [35]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8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114页,第170页,第114页,第114-115页。
- [13] 连横《雅堂文集》,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180页。
- [14] 陈文达《台湾县志》,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268页。
- [16] 《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二辑第十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488页。
- [17] [22] [36] [37] [55]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1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73页,第80、206页,第373页,第421页,第373页。
- [18] 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16页。
- [19] [27] [32] [61] 《清官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一,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年,第112页,第112页,第176页,第68页。
- [21] 《清官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三,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年,第1484页。
- [23] [45] [69] 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119页。
- [24] 连横《台湾诗乘》,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82页。
- [25] [68] 丁绍仪《东瀛识略》,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84页。
- [26] [28]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46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166-167页,第166页。

- [30] 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第584页。
- [33] 江英、赵晓梅等《西瓜冰温贮藏保鲜技术的研究》,《食品工业科技》2005年第12期,第174页。
- [38] 《清实录·第42册·文宗实录(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08页。
- [39] 《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838-840页。
- [40][41] 朱仕玠《小琉球漫志》,台北:台湾银行,1957年,第95页,第39页。
- [42] 俞炳坤、张书才《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478页。
- [43] 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 [44]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数据库,文书序号0055246。
- [46] 《内阁户科题本全宗》税课类,关税项,乾隆七年,第39号。转引自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第134页。
- [47] 孔安国传《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页。
- [48]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34页。
- [49] 详情见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第7页;董建中《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43页;刘杜英《浅析清代宫中进单》,《多维视野下的清宫史研究——第十届清宫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99页;李石《清代康熙朝官员进贡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页。
- [50] 《辞海》,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94年,第1073页。
- [53] 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第129页;董建中《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第40页。
- [54] 刘杜英《浅析清代宫中进单》,第497页。
- [56] 《清实录·第5册·圣祖实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3页。
- [57]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264页。
- [58] 周钟瑄《诸罗县志》,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297页。
- [59] 范咸《重修台湾府志》下册,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509页。
- [62]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20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29页。
- [63]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21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145-147页。
- [66] 钟兴麒等注《西域图志校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23页。
- [67] 董天工《台海见闻录》,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53页。
- [70] 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下册),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981页。
- [73][75]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第697-698页,第677页。
- [74][78] 郝时远《清代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朝觐事迹考》,《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17页,第125-128页。
- [76][79]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14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02-303页,第305页。
- [77]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86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责任编辑:陈小冲)

A Discussion on the Watermelon Tribute from Taiwan to the Emperors of Qing Dynasty

Fang Shenghua

Abstract: The products from Taiwan, especially watermelon, began to be paid as a tribute to the imperial court after Kangxi unified Taiwan. The tribute of watermelon and other products is not only a way for the Qing Dynasty to understand Taiwan, but also a political symbol of its rule and enlightenment over Taiwan. In fact, the watermelon tribut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generations of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with both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rticularities of the tribute paid by the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For example, the melon species for the tribute was not produced in Taiwan, and the Taiwan melon tribute stopped in the generation of Qianlong when the practice of tribute by officials was the most popular. Therefore,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discussion of its particularity can be helpful to ou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ibute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aiwan, watermelon, tribute, native product